

“草原部落” 黑马文丛 ● 贺雄飞主编

摩罗 著

耻辱者手记

一个民间思想者的生命体验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一个思想先锋的呐喊
一个精神魔鬼的忏悔



耻辱者手记

耻辱者手记

魏晓伦

九二年十月
贾平凹



“草原部落”黑马文丛 ● 贺雄飞主编

耻辱者手记

一个民间思想者的生命体验

摩罗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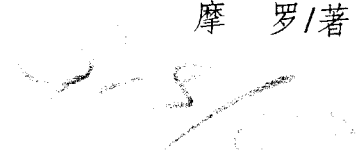
北京三联书店出版

“草原部落”黑马文丛·贺雄飞/主编

耻辱者手记

——一个民间思想者的生命体验

摩 罗/著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酋长话语

中国的文人是最低鄙下流的。

——黎 鸣

—

我同摩罗的相识，完全归功于《火与冰》的作者余杰。当时，余杰的书卖得正火，而且正被思想界广泛地认同。因此余杰的口气自然很狂：“当今时代，在思想随笔方面唯一能和我的文章媲美的青年学者只有摩罗。”我不信，自然要拿来摩罗的文章一读。那一夜，我喝着加糖的咖啡，听着德沃夏克《来自新大陆》的曲子，可心情怎么也平静不下来，只感到胸部隐隐作痛，口中咖啡的苦涩余味无穷。

纵观中国五千年文明史，文人历来是统治者的工具，得意的往往是御用文人。尤其在 20 世纪下半叶，反思历次重大历史事件中，中国文人的表演，我们不难惊醒地发现：中国文人是一群缺钙的软体动物。正如摩罗在《知识分子：若隐若现的神话》一文中所言：“我们也许有一百种理由喟叹我们的历史境遇过于严酷，可是，我们不是更有一千种理由反思我们自身的软弱、自私和卑污吗？时代所加给我们的挤压，我一刻也没忘过，可我同时也相信，时代并没有逼迫每一个人都像舒芜、蒲熙修等人那样在自弃自辱的路上走得那么遥远。”因此，当我国著名思想家黎鸣先生在余杰新作《铁屋中的呐喊》一书出版座谈会上发出“中国的文人是最低鄙下流的。”这一声呐喊时，全场掌声雷动、经久

• 1 •

不息。中国文人的灵魂是到了该拯救的时刻了，否则怎么迎接21世纪的曙光？摩罗做的是灵魂的生意，他是世纪末中国盗火的普罗米修斯，是拯救中国文人的精神天使。

摩罗来自于民间，也来自于底层，但他却地地道道是个“精神贵族”。他关注的是《巨人何以成为巨人》、《良知的弹性》、《鲁迅比我们多出什么》、《为什么写作》、《个性主义与人性尊严》等纯形而上的东西，他挖掘的是中国文人的劣根性，他的“中国文人不懂得耻辱”的理性之光成为一面观察中国知识分子人格的照妖镜，并为新一代的中国文人点燃了黑暗中的微光。他绝不是为了写作而写作，他的每一声啼血呐喊都让我们无地自容，照出每个人心中的魔鬼。他说：“在一个喜剧时代，最下流的行为，一定是以最高贵的名义出现的，最黑暗的灵魂，一定是以最光明的面目展示的。”摩罗就是魔鬼，因此他面对一切都毫无惧色。

摩罗是去过内蒙古大草原的，而且酷爱骑马。当我望着这个瘦弱单薄的躯体策马扬鞭的背影时，禁不住想起60多年前那个不住地咳血的瘦弱老头鲁迅。那么，一个摩罗这样的文弱书生，能拯救得了中国文人的灵魂吗？

二

不知不觉，“黑马文丛”已放出了六匹黑马了，那么，第七匹黑马将是什么样子呢？许多读者翘首企盼。他就是《北大往事》的作者之一，号称“北大浪子”和“北大醉侠”的孔庆东博士，他的文章被文化界誉为“继钱钟书以来真正的幽默”，他将带给您另一种感觉。中国的“黑马”是没有几匹的，我不知道这是中国的悲哀还是幸运？

无意之中，“草原部落”大家文丛也露出了笑脸，一马当先

的是贾平凹先生的序跋集《做个自在人》，希望读者同样能够喜欢。

此时此刻，一个哲人的声音突然回荡在耳旁，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贺雄飞

1998年中秋于
呼和浩特草原部落

“精神界战士”谱系的自觉承续（序一）

钱理群

坦白地说，我至今也没有弄清楚，摩罗的本名是什么；但我却要为他的“思想随笔”作序了。

第一次见到摩罗，我是有些惊异的：这样一个文静的书生，怎么竟然以“恶魔”自居，而且为文坛学界所认可？这一回，为写这篇序，通读了他的大部分文稿，又再一次面对这个问题，并且引起了长远的思索与无尽的感慨。

我想起了世纪初鲁迅对“摩罗诗人”的呼唤——“摩罗”的笔名显然是源于此的。那时候，鲁迅正在殚精竭虑地寻找创建中国的“近世文明”的道路，“别立新宗”，即为中国在20世纪的变革提供新的理想与价值；为此，他提出了“首在立人，人立而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文化偏至论》）的理想，从而在现代中国的历史上高举起了“个体精神自由”的旗帜。鲁迅认为，要实现“立人”的理想，关键是要有一批“精神界之战士”，对于“理想在不撓”的中国传统的“不争之民”来说，他们无疑是异端的反叛者，但鲁迅看来，这正是其价值所在。因此，他引来了19世纪西方以拜伦为代表的“摩罗诗人”以为同道，并且指明“凡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而为世所不甚愉悦者悉入之”。但鲁迅的呼唤，在世纪初的中国，竟是应者寥寥；他于是仰天长叹：“今索诸中国，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摩罗诗力说》）……

但在荒原中毕竟走出了第一批精神界战士，而且在焦虑的期待中，陆续有了后继者，经历了五四直至抗战的千锤百炼，中国终于有了一个以鲁迅为先驱的“精神界战士”的谱系。但是，接着出现的，却是精神界战士被惩罚、被改造，以至导致肉体与精神死亡的大悲剧。尽管对这悲剧产生的外在体制的，思想文化上的，以及中国知识者自身的根源，还有待于作更深入的研究，而且这也不是本文所要探讨的；但严酷的事实却是不可回避的：到了摩罗这一代，开始独立地面对世界，并要从前辈那里寻求精神资源时，他们所面临的，竟是一片精神废墟。正像摩罗在好几篇文章里反复强调的那样，尽管他对被权势树为敌人而历尽磨难的整整几代知识分子充满同情，但他却从受难的态度中并没有看到应有的反省与抗争，看到的却是已经渗入灵魂的麻木症、恐惧症与工具欲——他甚至从被人们普遍认为是最优秀的知识分子代表人物身上也或显或隐地看到了这样的顽症；这就意味着，不是个别人，而是整整几代知识分子，驯化，工具化了，而且至今也还没有引出必要的教训，以至他们中间少数觉醒者稍有反省，反而陷入孤立。这是真正的危机；苦难并没有转化为精神资源，精神界战士的谱系中断，失落了。这样的发现，使摩罗惊恐不已；而当他把目光再转向世界，就更感到困惑：为什么处于同样（相近）的境遇下，苏联与东欧国家的精神界战士的谱系始终未断，唯独中国的知识分子被改造（驯服）得如此全面，彻底，而且永不觉悟（还美其名为“永不反悔”）？这是怎样可怕的“中国国情”啊！而尤其让摩罗痛心的是，他竟然难以开口：因为——说出真相，就会打破某些人过于良好的自我感觉而“冒天下之大不韪”。但摩罗毕竟未经“改造”，血性尚在，勇气犹存，他奋笔直书，陆续写下收入本集中的《由从势者到求道者的位移》、《知识分子的覆没》、《耻辱是我们的精神资源》、《巨人何以成为巨人》等文，并且引起了舆论界的重视。而我却从他的这些文章里，重

又听到了鲁迅当年“今索诸中国，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的呼唤，经过一个世纪的牺牲，这历史的重复（循环），更让人感到透骨的悲凉——我们真的有“一切从头开始”的力量与勇气吗？

而对摩罗这一代来说，也许更为严峻的考验还在于他们自身的生存境遇。于是，又有了摩罗自称的那个“哭泣的黄昏”的“死亡体验”。这是同样惊心动魄的发现——

“我们一点也不懂得这是耻辱。我们已经完全没有灵魂，完全没有自我。我们因为没有自我与灵魂，所以也没有了对于尊严的需要，没有了对于人的生活需要。我们是没有需要的生灵，我们只需要一无所有，我们只配过一无所有的生活。”

“我们已经是非人，而且不是从今日开始的。”（《咀嚼耻辱·耻辱的心灵》）

“前面已经无路可走，每一条貌似路途的去向都布满无限的耻辱，被这耻辱摧残为非人乃是我们的宿命。我因为意识到无法摆脱这样的命运而万分绝望。”

“我真切地感到了灭亡的痛苦，我十分清楚地看到自己的肉屑四处飞迸。我无可挣扎地坠向耻辱的深渊。”（《咀嚼耻辱·非人的宿命》）

“我犹如大梦初醒。我扭着自己的头发，睁着恐惧的眼睛自责自问：我为什么曾经这样生活过？我为什么依然这样生活着？我还要这样生活下去吗？”（《咀嚼耻辱·耻辱的心灵》）

这是对自己的非人的生存境遇、无以摆脱的精神死亡宿命的体验，这才是真正令人绝望的。也正是在这个“颤抖的黄昏”、“哭泣的黄昏”，摩罗想起了鲁迅的“狂人”：“他知道自己是非人而对真的人怀着恐惧。他因为知道自己是非人而知道难见真的人”；并且引发了更为强烈的自责：“这种对于真的人的虔诚心哪

里去了？这种对于自身非人状态的耻辱感哪里去了？”——摩罗终于在经历了自身的绝望的生存体验之后，与鲁迅相遇了。摩罗自己说他是“以心灵感应的方式，独自发现了一个为我所独有的鲁迅”的；而在此之前，对教科书强制灌输的那个“鲁迅”他是“怀疑且抗拒”的。而心灵的共震恰是表明了摩罗正在以自己的方式接近鲁迅的传统：这自是意义重大的。

于是，摩罗又有了“光辉的（生存）体验”：那是类似于鲁迅（还有摩罗崇拜的孙中山）那样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准备着“战斗而且失败”的，“始终与中国社会最底层的人们一起挣扎”的反抗意志与“行动、创造、实践”的欲望，以及“总感到前面有一种声音在呼唤”，因而永不停止追求的“过客”式的生命选择——摩罗因此说：“那个黄昏，是我今生的第一次死亡，同时也是我的第二次新生。”

而且很快就有了“孤独的痛苦”的体验。摩罗回忆说，他因为公开宣布了“我们都是非人”的发现，被视为“疯子”而遭驱逐（这几乎是重复了鲁迅笔下的“狂人”的遭遇）。他于是发现了自己的异端性，感受到了作为社会的叛徒（公敌）的孤独。由此激发起“把自己与中国的文人区别开来，与一切奴格区别开来”的强烈欲望：“倘若他们自视为救主，我就甘为叛神；倘若他们自视为圣灵，我就甘为邪恶；倘若他们自视为人，我就只有做魔鬼。”他于是点明：“我为自己取名为摩罗，便是这番寓意。”（《咀嚼耻辱·中国文人》）

摩罗就是这样通过自身的绝望体验、光辉体验与孤独体验，而一步步地向鲁迅所呼唤的“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而为世所不甚欢愉”的精神界之战士靠拢。或者说，摩罗终于与鲁迅所开创的，已经中断了的精神界之战士的谱系承续上了。

这在世纪末的中国思想文化界，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

因为那个“干泣的黄昏”不仅属于摩罗一个人，有那样一批

年轻人在 80 年代末至 90 年代初这段时间内，经历了一场精神的蜕变；他们通过自己的（而非外部权威暗示的）绝望体验，开始面对世界与自我真实的（而非虚幻的）生存境遇，试图寻求“自救、自赎”之路。我曾经说过，我们这一代（或几代）中的部分人，是通过文化大革命中的绝望体验才真正认识与选择了鲁迅的，由此引发了我们在 80 年代思想解放运动中的种种思考；而现在年轻的一代中的部分人又在世纪末的绝望体验中，发现了鲁迅，而又不止于鲁迅（这是有别于我们这一代的）。鲁迅所开创的精神界战士的传统，正是在更具有独立性的新一代人这里断而复续了。在这样的背景下，摩罗的写作就超越了他个人的表达，而具有了某种典型性，成为新一代青年中的杰出代表。

摩罗自己似乎也是意识到了这一点的。他在《知识分子的覆没》、《思想随笔新三家》，以至《大作家刘震云》等文章中，谈到了“近年来”所出现的“自觉地寻找生命意义和精神价值，自觉地趋近求道者形象”的努力。他接着又谈到了当人们“立志求道时，这才发现世界上竟没有一个自己所需要的道，这才发现自己们的真实的处境，是如此地困窘，如此地危机四伏”：由此而激发了一代人的使命感，摩罗说：“一个时代所能意识到的危机，往往是从那些急需解决而且可能解决的命题中产生的。也许，‘五千年文明古国’的中国，真的到了一个文化转型、价值重建的关键年代？那裹挟我们几千年的巨大的历史惯性，真的要由我们这一代人来挣脱？”——或许，这也正是新一代的精神界战士所面临的时代使命？

“挣脱历史惯性，价值重建”，这自然是非一朝一夕之事；但思考与探索却必须从现在开始。摩罗正是将他自己前述刻骨铭心的体验，上升为理性的思考，提出了一系列发人深省的思想命题。

读摩罗的思想随笔，很容易就会注意到，他最频繁使用的一

个概念就是“耻辱”：这几乎成了永远压在他心上的梦魇，以至形成了摆脱不掉的心理情结；他因此而提出了“咀嚼耻辱，描述耻辱”的思想命题，并以此作为他自己与同代人觉醒的起点。所谓“耻辱”即是前文所引述的，既身处于“非人”的地位，却毫无自觉，甚至百般回避与掩饰，这也是鲁迅所说的：“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摩，陶醉”的奴才心态，众多的国民（包括文人）麻木于此，摩罗却以为奇耻大辱。因此，所谓“咀嚼耻辱”，即是走出麻木状态，摆脱奴才心理，正视苦难，直面耻辱，这是第一步。“咀嚼耻辱”也是人性尊严恢复的过程，而唯有以“人”的身分、心理、尊严去反观苦难，这才能达到对苦难的理性的“反思”，自觉的“反抗”。这就是摩罗所说的，“仅仅懂得（正视）苦难是不够的。苦难本身并不含有与苦难相抗拒的因子。只有我们从苦难中生起耻辱感时，才是对苦难的反思，才有可能起而反抗苦难。”反思也有不同层次。摩罗说：“苦难总是由每一个受难者分别承担的。只有耻辱才可使人类沟通。每一个生命个体的苦难，都是全人类共同的耻辱。每一个生命个体的罪恶都是全人类共同的耻辱。每一个生命个体的尊严的丧失，都是全人类共同的耻辱。”这就是说，必须把个体的苦难、国家、民族的苦难，上升到人类共同苦难的高度，反思才能超越于一己经验局限，达到更为普遍的层次，获得理论的深度与思想、精神境界的升华，所谓“咀嚼耻辱”正是包含了“正视，反思与升华”这三个层面：唯有如此，人们所经受的苦难与耻辱才能真正转化为精神的资源。而摩罗更是期待着，包括自己在内的这一代人在“咀嚼耻辱”过程中，“重新审视与确认自我与世界的关系”，建立起自身的“确定的体验”，即对人的非人化的高度敏感基础上的“深重的耻辱感”；并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立起自己的“稳定的性格”（按摩罗的解释，这种性格不是心理学意义上的，而是指在文化理想与精神信念上所具有的稳定的思想立

场、精神品格)，“重新规划与建立自我与世界的秩序”，在任何情况下，都坚持对奴役人的一切形态的抗争，坚守住自己的阵地。摩罗所说的“描述耻辱”所指的也正是建立在自身“确定的体验”与“稳定的性格”基础上，从自己内心找到的，属于自己的言说内容与方式。

摩罗，以及他的同伴，正是以这样的姿态与方式，发言了。

首先要“追问前提”(这也是摩罗的命题)，即对长期支配着人们(首先是自己)行为的，似乎具有天然合理性的，因而不须(也不容)置疑的前提性的观念提出挑战，追问其合理性。他问：“人究竟该为尊严活着，还是该为使命活着？”(《咀嚼耻辱·耻辱的心灵》)。他又问：“倘若一个生命的最高意义就是为国家牺牲自己，那这样的国家究竟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是合道的还是非道的？是合德的还是非德的？是该享祭的还是该献祭的？”(《什么是写作》)如摩罗自己所说，这是“从理所当然中看出荒谬，从司空见惯中感到惊讶”，这也是“重新估定价值”，要走出被神圣化了的虚妄。但却要触犯制造虚妄、并使其神圣化的利益集团的利益，更会触怒习惯于虚妄，精神麻木的多数。因此，这觉醒者的追问，便先天地带有悲怆的意味，这是我们在读摩罗的文章时，可以时时感受到的。

所谓虚妄就因为违背常识(常理)，“追问前提”其实就是要“回到常识”，摩罗干脆把他(以及朋友们)要做的事，归结为“言说常识，宣示常识”。这又是一个摩罗的命题，说的是大实话，却让人备感悲凉。因为我们今天(或者说半个世纪以来)所面临的始终是“常识的沦丧”，我们付出了那么大的代价，牺牲了那么多的人，都是源于忘了常识，或有意地抛开常识，去另立什么违背常识的“真理”。当年的鲁迅，如今的摩罗们，费尽口舌，说的尽是常识。比如，人活在世上“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革命是要人活，而不是要人死”(鲁迅语)等等；

比如，“人至上，人高于一切，人是直接目的。人是终极目的”（摩罗：《咀嚼耻辱·反叛非人》），等等。理论家或许会认为这些观点毫无新意，且已落后，不够“先锋”，更可以列举各种更为高明的新说：这些我都相信，但我认定的却是一条：这些常识在中国真正落实，还会有诸多阻力，还要费很大的劲。只要现状如此，摩罗的“言说常识，宣示常识”的命题就始终有意义。而且我相信摩罗的话：这仍然需要“人格力量，道德勇气”，“认识了常识并且说出常识，与认识了常识而说不出常识，二者的区别决不在于说与不说，而在于人格境界和精神自由上有天壤之异”。也还是摩罗说得好：“在自由的时代，每一条常识都只是一个简单的陈述句。可在某些特殊的状况中，由于常识和事实本身一样令人恐惧，说出常识往往成为一种壮举。透过微弱的呢喃，我感到一个强大的自我正在悄悄生长。这个自我不想淹没于外部世界之中，而是要超越于外部世界之上。”

我们所面对的正是这新一代的“强大的自我”，他们热切地追求个体的精神自由，同样热切地追求全人类的物质幸福与精神自由——他们早已宣布，“只要还有一个人处于煎熬之中，就是我们全人类的耻辱”，“爱一切苦难的生灵，并和他们一起解除生存的煎熬”，这是“唯一的选择”。作为本世纪精神界战士谱系中的后来者，他们已经认定要与一切奴役人（使人非人化）的制度、思想、观念作不妥协的反抗，他们深知自己所追求的是最基本的，也是“最深层的人性的需要与历史的需要”，因此时刻准备着“战斗后的失败”，并且正在磨炼自己对“大孤独、大诽谤”的承受力。他们当然有自己的弱点与不成熟之处，但正是他们自己在时刻无情地批判与反省着自己。在我看来，他们的真正力量与希望也正在这里——我从摩罗的思想随笔中看到了这一切，自是感到十分的欣慰。我知道，还有更多的年轻人在作着不同于摩罗们的选择，也自有自己的价值。在这世纪之末，有越来越多的

人，特别是年轻人，在经历了大绝望以后，又在进行新的思考，新的追求，新的探索，或者说，他们正在“从头开始”。对此，应该给予关注，给予支持，这是我们这些经历了无数的失败、挫折，并已无力重新来过，又仍对未来中国与世界抱有希望的年长者，所应作与可作的“最后的工作”——我因此而欣然为摩罗的第一本文集作序。

1998年8月30日深夜12时写毕于燕北园

惊心动魄的文字（序二）

余 杰

摩罗是笔名，取自鲁迅的《摩罗诗力说》。

“摩罗”这个词出自梵语，意思是恶魔。而最早被冠以这个称号的文人，则是以拜伦为代表的英国浪漫派诗人们。而今，一名中国青年自己把自己叫做“摩罗”，显然不是无意为之。在他的《中国文人》一文中，他这样解释自己使用“摩罗”这个笔名的原因：“我可以没有恩宠没有地位，可以没有名气没有桂冠，但我决不可以没有自我，决不可以没有独立人格。我一定要把自己与中国文人区别开来，与一切中国奴隶区别开来。倘若他们自视为圣灵，我就甘为邪恶，倘若人们自视为人，我就只有做魔鬼。1986年我为自己取名为摩罗时，便是这番寓意。同时我知道，我的灵魂早被奴隶的气息所浸透，要完全摒弃奴性哪是一个中国人所能轻易做到的。我只有怀着战战兢兢的虔诚之心，按着自己的要求尽力去做。”从觉醒的那一刻起，他在日常生活中，在写作中，就将这种追求一以贯之，12年了，终于结晶出这本大作。

我认为，摩罗的文章是20世纪末中国最惊心动魄的文字之一。90年代以来，中国文坛的主旋律是欺人与自欺，文人由社会的进步力量退化成帮凶和帮闲，他们左手拉着鲁四老爷、右手拉着假洋鬼子，亲亲热热如同一家人。王蒙、刘心武一帮曾经为自由而呼吁的文人，开始高歌现在的生活太美好、连自由也似乎太多了；而谈歌、刘醒龙等自称关注底层的青年作家，也在告示老百姓，忍着吧，面包总会有的。这时，摩罗出现了，摩罗说：“你们都在说谎，你们都在骗人！”他像中古时代的那个西班牙骑

· 1 ·